

清代滇桂地区与东南亚国家的交往

古永继

(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云南 昆明, 650091)

摘要: 清代, 国内外形势变化激烈。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 随着各国自身的变化及清王朝国势的强弱, 经历了一系列的动荡和演变。处于西南而与缅甸、老挝、暹罗、越南接壤的滇桂地区, 在国家之间交往的大背景下, 相互之间通过各种渠道来往十分密切, 在发展清朝与诸国的关系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关键词: 清代; 滇桂地区; 东南亚国家; 交往

中图分类号: K

文献标识码: A

清代, 是中国对外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 中国与相邻诸国之间长期存在的封建宗藩关系走向解体。至此之前的清中后期, 经由西南地区与东南亚缅甸、老挝、暹罗和越南的联系仍十分紧密。由于历史地理和民族文化因素, 与东南亚各国山水相连的滇桂地区, 在发展清王朝与诸国的关系之中发挥了特殊的历史作用。

一、缅甸

1644 年, 满清贵族取代了朱明王朝在中国的统治, 但 10 余年后, 其势力才真正进入云南。清顺治十六年 (1659 年), 南明永历帝率部分官员随从逃亡缅甸; 3 年后, 在清兵大军压境之下, 缅甸东吁王朝交出永历, 吴三桂将其带回昆明绞死。此后, 缅甸“不通中国者六七十年”。^[1] (卷 528)

乾隆十三、十四年 (1748 年、1749 年), 缅甸先后派人到云南请准入贡, 清廷未允。十五年, 通过在滇缅边境开采银矿而与缅甸关系密切的茂隆银厂厂主云南石屏人吴尚贤的联络, 两国开始交往。同年七月, 礼部议复云南巡抚图尔炳阿“缅甸初次奉表称臣纳贡”的奏称, 认为“应准其来京”, 得清高宗同意。^[2] (卷 369) 当年底, 缅使希里觉填一行 20 人在吴尚贤伴送下入滇, 云贵总督硕色按苏禄、南掌等国入贡成例, 拨银 2500 两作为接待经费, 派专人将缅使从边境迎送至省城, 于次年六月抵京。清高宗在太和殿“受缅甸国使臣朝贺”, ^[2] (卷 393) 收下所带礼物, 并回赠礼品甚丰。缅使希里觉填在完成使命离京返程中病逝于贵州安顺, 云贵总督硕色派人将其棺柩运回云南边界地方安葬, 立石竖碑。而在双方交好中起过作用的吴尚贤, 则因“久居外域”而被官府疑其势力坐大、要挟生事, 未允随缅使至京, 并在缅使回国后于昆明被捕入狱, 最后死于狱中。

乾隆十七年 (1752 年), 缅甸发生内乱, 孟族军队攻占都城阿瓦 (今缅甸曼德勒), 缅王被俘杀, 持续 200 多年的东吁王朝灭亡。不久, 阿瓦西北木梳村地区缅族首领雍藉牙率兵击败孟族, 建立起雍藉牙王朝, 又称贡榜王朝。清政府对缅甸的局势变化, 采取不干预态度。但雍藉牙王朝兴起特别是其子懵梭继位后不断向外扩张, 东部征服老挝, 东南攻灭暹罗阿瑜陀耶王朝, 西部控制曼尼坡 (今印度境内), 南部占据马来半岛; 东北部中缅边境, 则屡屡向云南境内孟定、耿马、孟连、镇康、普洱等地土司强迫进贡征税、索财骚扰、干预车里宣慰司事务等, 从而导致清缅间爆发了长达 5 年的战争。

乾隆三十年 (1765 年), 缅军进犯云南九龙江橄榄坝, 入据车里城。云贵总督刘藻不谙军机, 征讨不利, 后自杀。次年正月, 清王朝派大学士杨应琚自陕甘移督云南。清军连打胜战后, 因轻敌贪功又致失利, 缅军乘机进扰云南。杨被诏逮入京赐死。乾隆三十二年, 清廷从新疆伊犁调派

将军明瑞督军云南，增拨川、黔、滇及京师八旗兵 2 万多人，筹集各省军饷 6 百余万两，分路征缅，直逼其都阿瓦。但因孤军深入，损失惨重，明瑞也于战中阵亡。三十四年七月，清高宗派大学士傅恒为经略，调兵 3 万多人、骡马 6 万余匹及各种火器，对缅发起更大规模进攻。清军长驱直入攻至阿瓦城北五百里的老官屯（今缅甸杰沙）时，缅军据栅寨固守，双方僵持月余不下。适值气候炎热，清军病亡甚多，清高宗下令撤兵，而缅甸在清军的长期进攻下也感难以支持。十一月，双方遂通过谈判，达成休战撤兵协议。此次战争是清王朝为保卫边境安宁而进行的反击战，它虽未能取得军事上的重大胜利，但制止了缅甸雍藉牙王朝对云南边境的侵扰，有助于该地区局势的稳定。

老官屯和约签定后，双方关系并未立即正常化。由于双方对和约内容有不同解释，事后缅方未按中方的要求履行进贡许诺，中方也未按缅方的要求开关贸易。乾隆四十一年（1776 年），缅王懵驳死，其子赘角牙继位；6 年后，赘角牙被杀，懵驳兄孟云继位。此时期缅甸势力已从顶峰上跌落下来，赘角牙时中缅关系已出现转机，孟云继位后两国关系逐渐恢复正常。在此期间，云南边境的一些地方官和当地人士如顺宁知府全保、耿马土司罕朝瑗、永昌拔贡陈令宪等为双方之间的信息沟通，在滇缅之间做了不少工作。^{[3] (P176)} 乾隆五十三年四月，缅王孟云派遣出访中国使团 100 余人携带金叶表文、金塔、驯象、宝石及各种礼物进入滇境，云贵总督富纲派专人护送，于九月至京，清高宗在热河避暑山庄接见缅使，并回赠了礼品。五十五年，清高宗 80 大寿，孟云再次遣使进京祝寿，并请敕赏封号及开腾越关禁以通贸易。清高宗同意其请，正式册封孟云为缅甸国王，十年一贡。从此双方友好关系全面恢复并进一步发展。以后缅使频频入访，大大超过了十年一贡的定例，仅乾隆五十三至六十年的 8 年中，缅使到中国即达 6 次。截至光绪元年（1875 年），清代见于史载的缅使入访总计 17 次，清朝也先后 5 次遣使回访缅甸。^{[4] (P222)}

18 至 19 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掀起了殖民掠夺的狂潮，英国在吞并印度后，缅甸也成为了其觊觎的目标。1824 年、1852 年、1885 年，英国连续发动 3 次侵缅战争，使其成为了英属印度的一个省，完全沦为英国的殖民地。而中国，也自 1840 年英国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在此状况下，中国与缅甸官方的传统关系在光绪初以后基本断绝。

云南与缅甸山水相连，成为中缅双方交往的直接门户；除了国与国间的官方往来外，滇缅之间在各方面关系密切，矿业开发、商业贸易、移民往来等把双方紧密联系在一起。

南明永历亡缅及李定国、白文选率部转战滇缅边界，随从官员、将士及家属不少，失败后相当部分流落附近，以帮人做工、开矿或垦殖为生；在缅境者渐与当地民族融合，历经近百年，成为当地少数民族之一，但仍保留有不少汉族习俗，有桂家（又称贵家、鬼家）、敏家之称。《清史稿·缅甸传》说：“有波龙者，产银，江西、湖南及云南大理、永昌人出边商贩者甚众，且屯聚波龙以开银矿为生，常不下数万人。”“贵家者，随永明入缅之官族也，其子孙自相署曰‘贵家’，据波龙厂采银。”波龙银厂，位今缅甸腊戍以西包德温矿区。乾隆时，桂家首领宫里雁主持波龙矿事，“照例纳税于缅政府”。^{[5] (卷 28)} 波龙厂盛时，矿工达 4 万多，以至当地“商贾云集，比屋列肆，俨一大镇”。^[6] 波龙厂以东时归云南管辖的佤族部落葫芦地有茂隆银厂（位今中缅边界附近缅方一侧），乾隆时云南石屏人吴尚贤为厂主，其矿工二三万人多为云南及内地移民；矿区的发展不断吸引边界两侧商民附凑，“各土司及徼外诸夷一切食用货物，或由内地贩往，或自外地贩来”，^{[7] (P774)} 促进了内地汉族与当地各族的交往。内地移民的矿业开发，为当地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

商贸方面，双方互通有无，交易规模、涉及范围、影响程度都超过了以往历代。史称明末至清乾隆间，中缅双方通过云南而进行的陆路贸易相当兴旺，中国商队常以三四百头牛或 2000 匹马在中国及缅甸新街（今缅甸八莫）之间运送丝绸及其他货物。^{[8] (P6)} 中国商品从腾冲、龙陵陆路运至新街、老官屯，然后沿伊洛瓦底江水路进入缅甸各地；缅甸商品则溯伊江而上，至老官屯、新街，取陆路进入滇境，再运往内地各处。经云南输往缅甸货物主要有钢铁、锣锅、绸缎、毡布、瓷器、烟、茶、黄丝（即生丝）、针线等类，缅甸输入主要有琥珀、玉石、棉花、象牙、鱼、盐等

物，多为双方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物品，其中尤以丝绸、珠宝、棉花互为交换大宗。乾隆《腾越州志》卷3载：“今商客之贾于腾越者，上则珠宝，次则棉花；宝以璞来，棉以包载，骡驮马运，充路塞途。今省会解玉坊甚多，砉砉之声昼夜不歇，皆自腾越至者。其棉花则下贵州，此其大者。”清缅战争期间闭关禁市，双方均受影响。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战争虽已结束而中缅关系尚未正常，缅甸急需的中国黄丝已价增十倍；七年后，云贵总督李侍尧曾亲眼所见腾越关外新街、蛮暮等处，“捆载棉花，积如山阜”，而内地棉花价值，“即比往年价昂，尤为明验”。^{[9]（卷895，）}禁市对缅甸的打击更大，国计民生直接受到影响，故缅王孟云曾在遣使入贡奏文中说：“自禁止通商以后，边民生计艰难，还祈照旧关照，使小臣所产棉花等物籍以销售，不但小臣身蒙厚恩，即举国臣民均沐天恩于万万年矣，谨具表以闻。”^{[10]（卷11）}这充分反映了缅甸经济对滇缅贸易的极大依赖性。两国关系正常化后，边境贸易恢复，骡马商队又重新活跃在滇缅古道上，滇籍商人输往缅甸丝、纸、茶、针线、果品，运回棉花、海盐、羽毛、漆料、宝石等。特别是棉花贸易比原来更加兴盛，既消除了缅甸人民生计的困窘，同时解决了滇民的穿衣问题，并极大地刺激了云南纺织业的发展，使其于清后期成为了在国内颇有影响的棉纺织大省。英国人克劳福特估计，在19世纪初，滇缅贸易额约为30~40万英镑，至中叶上升到40万英镑；其中仅棉花一项，20年代每年输入云南者，其货值就超过20万英镑，重量不下500万公斤。清代滇缅陆路贸易额占到了缅甸出口贸易总额的1/4到1/3，规模相当可观。^{[12]（P214，P163）}自英国全面占据缅甸后，滇缅贸易虽仍在继续并进一步扩大，但已成为云南与英属缅甸间的贸易关系，性质发生了变化。

在滇缅两地的交往中，大量云南人来往于滇缅之间，并有不少流落定居于边界两侧，上述波龙、茂隆银厂矿工可谓突出例子；另外清缅战争中失散于缅甸的中国士兵不少，史载战争结束后，“中国战俘凡二千五百名仍羁缅甸，或事种植，或事工艺，并娶缅甸为妻”，^{[13]（P453-454）}其中即有部分云南人。而全省各地中，永昌、腾越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及悠久的对缅贸易历史，当地人赴缅经商最为普遍。光绪《腾越乡土志·商务篇》说：“腾越商人向以走缅甸为多，岁去数百人，有设立号房于新街、瓦城、漾贡者，亦有不设号房年走一次者。”缅甸八莫原是伊洛瓦底江边的一个小渔村，后来成为和顺华侨入缅的落脚点之一，逐步发达变成了繁华的商业城市。连远在京城的乾隆皇帝，也深知这一特点，在清缅交战期间曾敕谕军机大臣说：“腾越州和顺乡一带民人，向在缅甸地方贸易者甚多，……当禁其私带贼匪需用之物，出外贸易。”^{[2]（卷818）}因此，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永昌、腾越等地成为国际贸易口岸，商旅丛集，富甲一方，时人称永昌“市肆实物之繁华，城池风景之阔大，滇省除昆明外，他郡皆不及，人以此谓小南京焉”。^{[14]（卷5）}在滇缅贸易的发展中，云南回族发挥了重要作用。早在元明时期，即有一些回族商人往来于云南与缅甸等东南亚国家之间从事商贸活动，至清代，来往更加频繁。在滇西、滇西南一带，凡有回民居住的地方，几乎都有人在滇缅路上从事以马帮运输为主的长途贸易。据记载，19世纪上半叶，腾冲一带回族已有许多人来往境内外并移居缅甸：“腾之回教则以城内外、乌索、马家村三地为最著”；嘉、道间，“旅居缅甸为玉石、宝石、棉花商者半属之”。^[15]咸丰、同治年间杜文秀在滇西领导的回民起义政权，充分利用滇缅贸易通道，向缅甸出口石磺而购进棉花，再经纺织加工销售以获取财政收入；同时在缅甸瓦城开办经营棉花而规模不小的“元兴”、“元发”两间商号，至起义失败被查封时，所有货物本银约合3.4万余两。^{[7]（卷9P363）}起义失败后，大批回民为逃避清军追杀而入缅，一些地区出现较大的云南回民聚居区。最著名者为靠近边界佤族地区的班弄，至1896年，该村已有房屋200座，约2000人，还有用于马帮运输的骡马约1000匹等。另外缅甸其他地区如北部的腊戍、景栋、八莫、东枝，中南部大城市曼德勒、仰光等地也陆续有不少云南回民定居。^[15]

19世纪后期，中国与外界的联系日渐增多，一些经由东南亚地区外出公干之人把自己随身所见记录成文，其中有的即反映了云南华侨在缅甸的有关情况。如同治十年（1871年），腾越定冲军青年军官王芝在前往英国途中路过缅、印所撰《海客日谭》中说：在缅甸古都阿摩罗补罗，“滇人在此者四千余家，闽广人百余家，川人才五家”；在缅北新街，“滇人约千余，腾越人居其九”。光绪十七年（1891年），中国驻德使馆随员姚文栋离欧洲回国时顺道印、缅察看有关商务和滇缅边界情形，在缅甸看到，“闽商、粤商都在海口，约有万人；滇商散布于沿江及山中各埠，几与缅

商相埒，约在十万人左右”。^{[3] (P214、255)}侨居缅甸的云南人数量之多、分布之广，远远超出其他各省，从而在靠近云南的缅甸东北部地区阿瓦、八莫、孟拱等城市和矿区形成不少华侨聚居区，有的称为“德由谬”（中国城）；他们依靠自己的勤劳和智慧，与缅甸人民友好相处，对双方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如云南腾越和顺乡人监生尹蓉被缅王尊事为师，曾设计督建了缅甸曼德勒皇宫；当旅缅腾冲华侨商议扩建腾越会馆时，缅王慷慨划地并欣然由其挑选，结果会馆建在了缅京中心的黄金宝地通衢大街上。^[16]景栋城创建时，云南边民也“负弩以往”，故其城“与汉城无异”。^{[17] (P225)}有的滇籍人士还与缅甸人民共同抵抗侵略而浴血奋战，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如光绪十一年（1885年）英军第三次侵缅战争前夕，腾越都司、副将云南维西人袁善、保山人李文秀受云南地方当局委派至缅探察敌情，结果战争爆发不久，缅甸都城迅即失陷，袁、李决意出缅抗英，而清当局因害怕得罪英殖民者竟横加阻挠。最后袁善以抗令罪名被杀，李则冲破阻力，率兵不足千名，在猛拱保卫战中与英军大战，中炮重伤牺牲，弥留之际仍念念不忘“以驱洋人复缅甸为事”，其部属也先后战死500余人。^{[18] (卷3)}中缅两国可谓感情深厚、唇齿相依，双方间的“胞波”友谊，是长期以来两国人民共同努力、精心培育的结果，这种关系建立于久经考验的历史基础之上，而清代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

二、老挝

18世纪初叶，老挝历史上的澜沧王国分裂为万象、琅勃拉邦、占巴塞等3个小国。位于北部同云南交界的琅勃拉邦为了在同其他王国的纷争中取得邻国支持而继续与中国通好，清代文献中称其为“南掌国”或“老挝南掌国”。

雍正七年（1729年）九月，云贵总督鄂尔泰奏言南掌国王岛孙遣使奉销金緡字表文及驯象请求入贡，并请永定贡期，得清世宗允准。老挝使者入云南后，地方官沿途护送，于次年二月至京。清王朝隆重接待，赐给敕谕并文绮等物，命五年一贡。自明万历末老挝因外侵内乱而与中国停止交往100余年后，至此双方关系开始恢复。乾隆八年（1743年），清高宗考虑其道远不便，命改为十年一贡。整个清代，南掌王国共向清朝派遣使者24次，清朝于道光时遣使回访1次。^{[19] (P201-204)}老挝最后一次入使未能进京，时为咸丰三年（1853年）中国南方爆发太平天国起义，进京道路不畅，朝命云南当局对使者从优接待后让其返国。但随后云南回民起义又兴，南掌也先后被暹罗、越南所瓜分，1893年以后又沦为法国殖民地，同中国的官方交往遂绝。

中老之间经济关系密切，主要表现为朝贡形式下的官方贸易，以及滇老民间的相互往来。

在官方交往中，南掌使者所带礼物一般是大象、象牙、犀角、孔雀尾、土绸等特产；清王朝按照薄来厚往惯例，招待和赏赐对方的费用仅云南即规定白银2500两且实际往往超出，至京后另有大量的回赠物品绸缎、布匹、服装、毛毡、茶叶、玻璃、纸张、瓷器及若干生活文化用品、工艺品等，类别、数量繁多。入贡使团从云南普洱府入境，沿途均有接待护送，仅今西双版纳地面即设有勐仑、勐勐、勐征一勐胎一把岛、橄榄坝、勐型5个接待站，每站接待时要依制向对方出赠礼品。^{[19] (P209-210)}普洱府成为滇老交往中的重要门户和窗口，因省城尚无熟悉南掌语言文字人员，乾隆时通晓南掌书字的清军驻普洱将军雅郎阿，即成为当时处理双方来往行文中难得的人才。

民间贸易主要在滇老两地之间进行。普洱府与老挝接境，经边境地猛腊，出猛润隘口，可至老挝的猛温（今芒温）；另经猛烈（今江城县），由猛乌、乌得、整发，可入老挝、越南及暹罗。^{[20] (P353)}这些道路，同时也是双方间的主要商道，云南商人利用马帮向其运进茶叶、布匹、黄腊、蚕丝、绸缎、铜器、铁锅、地毯等物，而收购鹿茸、象牙、安息香及山货药材等土特产回内地。老挝的特产名花神品兰，滇民移植入内，“新兴（今玉溪）人善养之”，并移栽到扬州一带，“人争来看，门几如市”。^{[21] (3)}当地边民相互间的市易更络绎不绝。道光《云南通志稿》卷187《南蛮志·种人六》载：老挝，俗呼为挝家，“即南掌夷民也，……其近在普洱府东界外者，常入内地贸易”；“善治生，时入城市，懋迁有无”。滇、老交界的边境地区分布有众多跨境民族，除老挝种人外，尚有艮子、莽子、戛于腊、蒲人及苦葱等，相互间的来往也十分密切。在清缅关系紧张时期，

中国百姓被禁止私自越境外出，老挝积极协助云南官方堵截隘口。史载乾隆三十六年（1771 年）老挝使者入贡，曾将“潜出外境，贸易觅利”的内地民人邹纪敏、郭子光 2 人随同解交云南有关部门；四十四年，又将盘获的两广、云南商民陈文清等 5 人及“自南掌地方携带象牙、犀角、鹿茸、孔雀尾等货，连人一并解究”。^{[2]（卷 883、1080）}当双方局势动荡时，则往往有边民互逃入对方境内避难。如雍正七年（1729），车里橄榄坝土司李阿先反清，焚烧汛房，兵民惊溃，数万人逃入老挝；叛乱平息后，南掌国王岛孙派人将其护送出境，云南地方官为此曾两次赠给南掌绸缎、布匹以示感谢。^{[22]（P353）}乾隆四十六年，则有逃入车里宣慰司寄居的该国百姓 50 户 182 口，在南掌国主要求下，被安排于贡使回国时交由带回。^{[2]（卷 1141）}

在两国经济文化的交流中，华侨起着重要的作用。老挝的华侨多来自云南和两广，主要居住于湄公河沿岸琅勃拉邦、万象等地，大部分从事商业，也有的经营采矿业。据记载，从明代永乐时起，就有中国人移居老挝，此后逐步增加，到明末清初已有约 3000 人。清代中后期，华侨经济在老挝已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南巴登的露天锡矿，就是由华人首先开采；在富散山，华侨们采集野生茶叶，加工后制成“镇宁茶”，受到当地人民所喜爱。^{[23]（P193）}有的还在当地传授先进的生产技术，如“教以制酒醴、养蚕丝之法”，帮助老挝人民发展酿酒业和丝织业。^{[24]（卷 528）}

三、暹罗

清前期的泰国，分为暹罗和八百两个部分，都与中国保持着联系。清朝建立后，在京师设四译馆，其中有暹罗馆和八百馆。顺治九年（1652 年），暹罗阿瑜陀耶王朝遣使请贡得允，从此奉贡不绝。康熙四年（1665 年），定暹罗贡期 3 年一次，贡道由水路经广东，贡船以 3 艘为限，每艘不许超过百人，入京员役 20 名。十二年，清廷应其所请，册封暹罗国王，赐诰命银印。^{[24]（卷 528）}乾隆三十二年（1767 年），阿瑜陀耶王朝被缅甸攻灭，华裔将领郑昭率军抗缅复国，建立吞武里王朝。吞武里王朝以及随后继起的却克里王朝（现今曼谷王朝的前期），都主动与清王朝交好，遣使入贡。其使入访时往往携带大批货物，暹王并组织专门船队到中国沿海港口交易。清王朝也通过免税优待，在康、雍、乾时多次鼓励暹罗及中国商人运送大米到闽、粤、浙沿海销售以解决当地缺粮问题，并允许中国商人在暹罗造船贩运货物。暹罗的其他特产柚木、胡椒、食糖、苏木、香料、象牙等，从而源源不断输入中国。咸丰五年（1855 年），暹罗被迫与英国签订《英暹条约》，接着美、法、日、俄、意等西方 15 国纷纷效法，相继与之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暹罗进入半殖民地时期，与中国交往渐疏。自顺治时首次向清王朝入贡，到同治八年（1869 年）上疏请废“贡献之礼”，暹罗前后遣使入访达 60 余次。^[25]

位今泰国北部的八百媳妇，通过云南与内地交往，元、明时即关系密切。明嘉靖时八百大部地区被缅甸东吁王朝占领，土司避居景线，名小八百，对中国朝贡一度断绝。入清以后，八百仍在设法入贡中国以寻求保护，但未被接受。雍正六年（1728 年），云南官府于边境思茅、橄榄坝设官戍兵以扼通缅门户，“老挝、景迈二国皆来贡象，缅甸震焉”；九年，“景迈使至普洱求贡，乞视南掌、暹罗，云贵总督鄂尔泰疑而却之”。^{[26]（卷 6）}中缅战争之初，清军攻入缅境，孟艮、八百一带土司主动归附。乾隆三十一年（1766 年），清朝于孟艮地设孟艮土指挥使（今缅甸景栋），八百地设整卖（即景迈，今清迈）宣抚司、景线（今清盛）宣抚司、六本（今南奔）土守备、景海（今清莱）土守备四个土司。^{[27]（卷 136）}后来清军失利，缅甸重新控制孟艮，整卖等地土司与清朝的联系又被隔断。乾隆三十二年，暹罗阿瑜陀耶王朝被缅甸攻灭，不久郑昭起兵复国建立吞武里王朝，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 年）平服景迈，八百土司之地自此属于暹罗，且成为暹罗北部与中国交往的重要门户。史载从今云南西双版纳南部边境，可从陆路通至暹罗的景迈及国都曼谷等地：“商人由车里出外域贸易者有四道：一由易武猛白乌经猛岭，一由大猛龙至猛岭，一由猛混、猛艮至猛八，以上三路均可至暹罗之景梅一带。其由孟艮西过达角江，则走缅甸路也。”景梅即景迈，当时已是人烟稠密、商贾云集，“至暹都水路十六天，陆程十二日，至盘安水路半日便可以到莫洛缅”。^{[28]（卷中）}莫洛缅，今缅甸港口城市毛淡棉。即商人出滇境后先入缅甸或老挝，再至暹罗，并可经水陆分别南下到暹罗国都曼谷及缅甸海湾，从而与“海上丝绸之路”相连。另外从云南思茅

进入老挝丰沙里，向南穿过琅勃拉邦，再向西也可进入泰国清迈地区。

同缅甸、老挝一样，在暹罗北部也活跃着不少云南人。很早以前，滇、川等地的马帮商队就不断来往于中国西南至缅甸、印度、泰国、老挝、越南等国的古道上，元明以后则以回族商帮最为有名。19 世纪中叶杜文秀起义失败后，又有相当数量的云南回族商人迁居暹罗诸国，不少人从事长途贩运，带往暹罗的货物主要有核桃、栗子、丝绒、布料及铜制器皿，驮回云南的则有原棉、宝石、谷物等。并有不少云南人在暹罗定居，而居城镇者主要是穆斯林。19 世纪初，清迈城内已开始建有清真寺；至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清迈已成为云南穆斯林在中南半岛的聚居中心之一。此时期泰北的不少农村，如泰缅边境至清迈东北部的坊区及清莱府至夜功河一带，也都出现了一些云南人的小规模聚居点，他们大多在当地开荒种地，有的则作为小商贩走村串寨，活跃于各族山民间。^[29]分布在暹罗南部地区的华侨，则多为从广东、福建等沿海各地移入者。“19 世纪 30 年代，曼谷 40 万居民里有 20 万中国人，12 万暹罗人，1.2 万越南人，1 万高棉人”；“在暹罗其他城市，中国居民常常在数量上超过暹罗人，有些城市里住的全是中国人——商人和手工业者。”^[30]
^(P326)清代暹罗的华侨数量远远超出东南亚其他国家，这与当时曼谷王朝采取的欢迎和帮助中国移民进入有关。

四、越南

越南，清中期前称为安南，与中国之间维持着传统的宗藩关系。明嘉靖时安南分裂，权臣莫登庸与安南王黎氏相争，黎氏占据南方，莫氏占据北方，均先后被明朝授为都统使，与明朝保持着朝贡关系。清顺治初，莫氏归附，继为安南都统使。顺治十六年（1659 年），黎氏遣使纳款；次年，黎维祺自称安南国王，奉表入贡。康熙五年（1666），黎维禧缴送南明永历敕印，清遣使册封其为安南国王。此后黎氏不断攻击莫氏并夺其踞地高平，莫氏逃亡中国广西。二十二年，莫敬光病亡于广西泗城土府，莫氏王族遂绝。

乾隆中期，黎氏势衰，辅政大臣郑氏、阮氏专权构兵，郑氏拥黎朝占据北部，阮氏占据南部。双方的抗争混战，使社会矛盾不断加剧。乾隆三十六年（1771 年），阮岳、阮侶、阮惠等 3 兄弟于归仁府领导西山农民起义，首先打垮南部的阮氏（其有娠之妻逃脱，后携遗腹子阮福映辗转逃至暹罗），后又攻灭郑氏，占领都城升龙（今河内），控制了黎氏政权。乾隆五十二年，阮岳于归仁称中央皇帝，据安南中部地区；阮侶、阮惠分别称东定王、北平王，分据南、北地区。阮惠不服，于次年在顺化称帝，建立起西山王朝。黎维祈不满所处傀儡地位，趁阮氏兄弟倾轧之机举兵反抗，被阮惠打败，逃亡广西边境请援。清朝作为宗主国，以“兴灭继绝”、“灭阮扶黎”为己任，于五十三年十月派两广总督孙士毅率兵 2 万，分别从广西镇南关、广东钦州、云南蒙自莲花滩三路入安南。在攻克黎城（东京）宣诏袭封黎维祈为安南王后，孙士毅不听清高宗“撤兵回粤”旨令，滞留黎城且麻痹轻敌，被阮兵夜袭大败，狼狈逃回镇南关内。黎维祺被安置于北京供养，不再归国。阮惠惧怕清军再讨，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 年）叩关谢罪，改名阮光平，遣使入贡，恳赐封号。清朝基于现实，承认其统治地位，册封为安南国王，双方间的正常交往得以恢复。

嘉庆七年（1802 年），在暹罗和法国殖民者支持下势力兴起的阮福映攻灭西山阮氏政权，建都顺化，向清朝遣使入贡求封，并请改国号为“南越”。清廷认为历史上的“南越”包括疆域甚广，现安南不过交趾故地，不得以“南越”为名；最后同意用“越南”为国号，册封阮福映为越南国王。越南国名于此沿用至今。

在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中，西方各国都把亚洲作为掠夺的重要目标，特别是法国殖民者，吞并越南进而染指中国的野心由来已久。早在明末，即有法国传教士至安南布教，至清代更加紧了政治、经济方面的侵略活动。乾隆五十二年（1787 年），经在暹罗的法国主教百多禄撮合，正在谋划“复国”的阮福映与法国签订了割地和允许其商船战舰航行各省的《越法凡尔赛条约》，以换取支持。后来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条约未能兑现。阮氏政权建立后对法国的威胁也有所提防，曾多次下令禁止传教，实行“闭关锁港”政策。但这种抵抗在侵略势力面前显得十分软弱，

法国则以武力为后盾，一步步加紧了对越南的扩张和掠夺。嘉庆二十二年，法国要求越南履行《凡尔赛条约》，遭到拒绝；道光二十三至二十七年间，法国借口越南反教，多次派兵进行威胁和赔款勒索；咸丰八年，联合西班牙武装侵占越南的安海、奠海等地；同治元年（1862年），强迫越南签订了第一次《西贡条约》，取得了占有南圻的边和、嘉定、定祥三省与昆仑岛，以及赔款、开埠、传教等特权。同治十二年、光绪八年两次入侵北圻，攻占河内，逼签第二次《西贡条约》。其间越南军民及当时在越南北部以刘永福为首的中国农民起义队伍黑旗军对法国的侵略进行了联合抗击，先后在河内近郊纸桥两次大败法军，击毙其头目安邨、李威利等。光绪九年（1883年）六月，法国利用越南王室内争之机进攻顺化，迫使阮氏王朝签订《顺化条约》，取得了对越南的“保护权”。此后法军不断向北推进，直逼中越边境，同年底向驻越清军发起攻击，挑起中法战争。年近70的清军广西关外军务帮办冯子材就任统帅，取得镇南关、谅山大捷，刘永福黑旗军也在临洮大败法军。但清廷腐败无能，光绪十一年（1885年）于天津签订了《中法会订越南条约》，承认法国对越南的殖民统治，造成了不败而败的屈辱局面，中国与越南的传统“藩属”关系就此结束。

越南与两广、云南相邻，清代从中国进入越南主要有4条水陆通道：陆路，一由广西凭祥进入谅山，二由云南河口进入越南老街、河内，三由云南金平进入越南莱州；水路，由广西北海、钦州、东兴乘海船可抵越南海防、鸿基，最南可抵西贡。另外，与越南接壤的广西南宁府、太平府、镇安府，云南临安府、开化府、广南府的不少地方也有小路通往越南，而官方间的相互来往仍同明代一样主要通过广西。与明代相比，清代中越经济贸易发生了重大变化，即随着两国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传统的朝贡贸易所占比重相对下降，市场贸易逐步成为双方经济往来的主要形式。贸易水陆分途，陆上主要在桂越、滇越之间，海上主要在钦州、廉州、沿海各地与越南不同港口之间。

清代广西段中越陆路通道主要有关、隘、卡三种，一般设有官军戍守，史载有“三关百隘一百二十余卡”及“入越南要道一百六十四处”之说。据统计，在中法战争前夕，今广西段在清代的中越经贸陆路孔道共有3关、92隘、52卡，共147处，构成了广西入越160余处要道的主体。^[31]诸要道中，又以清朝官府指定为中越边民开放互市的平而关、水口关及贡道所经镇南关附近的由村隘为干道枢纽，陆路边贸较大的贸易主要由此3处出入。经由村隘可通往越南驱驴、禄平、文渊等处，距宁明州110里，为各处货物聚集之所，比从平而、水口两关出入道近数百里，故“宁明商贩愿从出入”，使得当地客商凑集；而附近明江53寨村民，仰赖挑担营生，多由此过境私运海盐等物回内地贩卖，官府难以禁止。^{[2]（卷219）}与此对应，在越南边界一侧分别形成了高平镇的牧马、谅山镇的花山和驱驴三大边贸市场。其中驱驴市场规模最大，设有太和、丰盛两家商号，越南官府还设置廐长、市长及保护、监当各一人以进行管理。花山市形成于较晚的乾隆五十八年，亦设有市长、监当之类管理人员。^{[2]（卷1434）}

在广西关口，边民出境需向官府申请证件。乾隆时规定，出境贸易者先向本籍地方官呈报，填写具有姓名、年貌、籍贯、货物及发往何处等项内容的“印照”，经查实后再领取“腰牌”，才能出关；时间及所至地方也有限定，不得擅自远出或逾期逗留，否则有关保人将受查究。但出入管理只在少数重要的正口关隘能收到实效，边界沿线许多通道则官兵难以设防，不少地方“私路皆可透越，实不能一概堵塞”，^{[2]（卷237）}如东兴街、竹山村与越南的吒砦、暮彩等处“三十余里，在在可通，河水亦褰裳可涉”。^[9]从而使双方的人货流量实际增加不少。经边境陆路出口越南的货物，有烟茶、纸扎、瓦器、铁锅、布匹、鞋帽、油觔、绸缎、药材等生活用品；入口的主要是食盐及零星的砂仁、大茴、交绢、竹木、薯蓣之类，在类别和总量上要少得多。

清代滇越间的贸易，主要集中在滇南尤其是开化、临安、普洱、广南等府所属边境地区。开化府以南的马白关（今马关）为出入越南要隘，多有商人经此入越贸易。雍正十三年于开化府设税口征收过境茶税，每百斤征税3钱2分，得税银196两。^[32]马白关东南一度未明确立界地区有都龙铜矿，中越双方民众前往开矿及贸易者甚多，平时聚居达万人左右。^{[33]（P1296）}临安府蒙自南200里蛮耗设有通越南关口，又水路200里地名坝洒，康熙时蒙自钱局于此立市卖铜钱，“交人喜

于得钱，蒙局因以为利”。因出口铜钱有利可图，云南官府遂向朝廷建议行文与安南国王联系，让其每年将所需铜钱数量及价格事先报上，准一年两次派官到蛮耗，“纳价领钱，随到随即发回”。

^[7]（卷 8P428）在滇越贸易中，云南销往越南的货物主要有井盐、铁制农具、丝织品、瓷器、中药材、猪、牛、牛皮、麻布、铜器、纸张、蓝靛、神香、调料、广南鸭、茶叶及其他生活用品，输入者为鸦片、染料、布匹、鹿茸、虎骨、象牙、皮张等。

在中越边境贸易中，大宗货物多走海路。钦州、廉州地区人多地少，粮食不足，历来依靠安南大米接济，官府积极鼓励商人前往贩米，另外还实行低税率以及减免优惠政策等，使得安南大米源源而至；同时输入的货物还有槟榔、胡椒、冰糖、砂仁、牛皮、海参、鱼翅等。粤、桂、滇、黔等地商人也纷纷贩运各自土特产而来，再将海味和舶来品运回内地销售，使得钦、廉一带的对越贸易十分兴盛。今广西沿海城市北海，嘉庆前还只是一个小渔村，至道光初年已成为“商贾辐凑，海舶寄碇”而规模初具的沿海港市；同治末年，更是成为了外国人眼中在华南地区与广州并列的两个主要港口之一。^[31]

清代的越南分布有不少华侨，居南方者多为经海路而至的福建、广东人，居北方者多为从陆路进入的云南、两广人。越南矿产资源丰富，各地金、银、铜、锡诸厂多招募华人掘采，云南及两广地区不少农民即往往通过边境陆路进入越南矿山。虽然双方当局对此控制极严，康熙时安南官府即限定“每矿多者三百人，次者二百，少者一百，毋得过数”，但随着矿山经济的发展，限定多为具文。生产银锡矿的北部地区太原通州送星厂，乾隆三十二、三十三年即是一个“佣夫至以万计”的大厂，其中不合规定而“应押令回籍”的内地客民即达 5000 余人。^[34]（卷 35、43）中国侨民与越南人民和睦相处，有的互结为亲戚，如钦州所属东兴街与越南万宁州之江坪陆路仅 5 里，中有小河相隔，内地各省商贾会集江坪，“民多婚娶安居于斯焉”。^[35]（卷 5）华侨和当地人民一道，为越南的开发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结 语

缅甸、老挝、暹罗、越南与滇桂两地山水相连，在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入侵前一直同中国保持着长期中形成的封建宗藩关系，而这种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与滇桂间的相互交往来实现的。在此关系下，藩属国定期向清王朝朝觐进贡，并在旧王去世、新君继立时告哀和请封，以求得到中国在政治上的荫护和提高自己在邻国中的地位，并在同中国的贸易中获取经济利益；作为宗主国，清王朝则有维系属国正统统治和调停诸国矛盾的责任和义务。这种关系以小事大，有其不平等的一面，但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与殖民地和附属国间的关系。在政治上，清王朝对藩属国所要求的，只是为维护“万邦来朝”的天朝尊严和保持边境地区的安宁，因而在与对方的交往中，除由皇帝下敕颁诏、遣使吊唁死者或册封新君外，并不干涉其内政外交事务，只有在自己边疆受到侵犯或属国发生外侵内乱受其邀请履行宗主国职责时，才会出兵加以干涉，乾隆时的清缅战争、与安南西山政权的冲突及同治、光绪时的中越联合抗法即为此类。在经济上，藩属国进献贡品时，清王朝往往以天朝大国的姿态，薄来厚往给予回赐，其数量、价值远远超过贡品，使“朝贡贸易”成为一种国与国间相互交流而互不等价的特殊交换形式，蕴含着丰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内涵。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打破了亚洲各国社会发展的进程，也使中国同邻近国家的宗藩关系走向解体。云南、广西位居西南边陲，作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来往的桥梁和基地，在数百年间国家关系的起伏跌宕中扮演了双方经济文化交流聚散中心的角色。故当清王朝推行闭关锁国政策，在东南沿海严格控制对外交往之际，对西南地区则表现出相当的宽容，使得滇桂两地通过各种渠道与境外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而不同时期相互交往的方式、特点及内容的不同，则成为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发展的直接见证和对外政策取向的座标之一。了解清代滇桂地区与上述国家的交往概况，对我们今天发展中西部、开发大西南而提供历史借鉴，不无积极的价值和意义。

参考文献:

[1] 清史稿[M].

- [2] 清高宗实录卷[M] .
- [3] 余定邦, 中缅关系史[M],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0 .
- [4] 云南省历史研究所编, 〈清实录〉越南缅甸泰国老挝史料摘抄[M], 云南: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5; 马曜, 云南简史(增订本)[M], 云南: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1 .
- [5] 永昌府文征[M] .
- [6] 周裕, 从征缅甸日记[M] .
- [7] 方国瑜, 云南史料丛刊[M] . 云南: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1 .
- [8] 云南历史研究所, 缅甸的滇侨(油印稿)[M] .
- [9] 清高宗实录[M] .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军机处录副奏折, 外交类[M] .
- [10] 永昌府文征·文录[M] .
- [12] 贺圣达, 缅甸史[M]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2 . 吴兴南, 清代前期的云南对外贸易[J] . 云南社会科学, 1997, (2) .
- [13] 哈威, 缅甸史[M] .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3 .
- [14] (康熙)永昌府志[M] .
- [15] 何平, 移居缅甸的云南回族[J] . 民族研究, 1997, (1) .
- [16] 尹文和, 云南和顺侨乡史概述[A] . 云南省历史研究所. 研究集刊[C] . 1984 (2) .
- [17] 马曜, 云南简史(增订本)[M], 云南: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1 .
- [18] 永昌府文征·列传[M] .
- [19] 申旭, 老挝史[M] . 云南: 云南大学出版社, 1990 .
- [20] 陆韧, 云南对外交通史[M] . 云南: 云南民族出版社, 1997 .
- [21] 檀萃, 滇海虞衡志·志花. [M]
- [22] 景振国, 中国古籍中有关老挝资料汇编[M] . 河南: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5 .
- [23] 马树德, 中外文化交流史[M] . 北京: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2000 .
- [24] 清史稿·属国列传三[M] .
- [25] 据云南省历史研究所编《〈清实录〉越南缅甸泰国老挝史料摘抄》统计。
- [26] 魏源, 圣武记·征缅甸记[M] .
- [27] (道光)云南通志稿[M] .
- [28] 黄诚沅, 滇南界务陈牍·刘春霖普洱边界图说[M] .
- [29] 申旭, 回族商帮与历史上的云南对外贸易[J] . 民族研究, 1997 (3); 何平, 泰国北部的云南人[J] . 云南民族学院学报, 1996 (4) .
- [30] 王民同, 东南亚史纲[M] . 云南: 云南大学出版社, 1994 .
- [31] 黄滨, 张斌, 清代广西段的中越贸易[J] . 东南亚纵横, 1998, (4) .
- [32] 张若骙, 滇云纪略[M] .
- [33] 方国瑜, 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M] .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
- [34] 越史通鉴纲目[M] .
- [35] 魏源, 海国图志·粤中见闻[M] .

Contacts between Region of Yunnan and Guangxi and Southeast Asia Countries in the Qing Dynasty

GU Yong-ji

(Center for Studies of Chinese Southwest's Borderland Ethnic Minorities, Yunnan, Kunming, 650091)

Abstract: In the Qing Dynasty, domestic and foreign situations changed fierily. Th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countries underwent serial roils and changes with changes of themselves and weakness or strength of the Qing Dynasty. Region of Yunnan and Guangxi is in southwest of China and border on Burma, Laos, Thailand, and Vietnam.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ontacts among countries, it dealt with these neighbouring countries intimately by all kinds canals. And these contacts play a special role in developing relations between the Qing Dynasty and other countries.

Key words: the Qing Dynasty; region of Yunnan and Guangxi; Southeast Asia countries; contacts

收稿日期: 2004-8-27

作者简介: 古永继 (1953-), 云南建水人, 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 主要从事古籍整理及地方史研究。

(责任编辑 晓斌)